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

# 航母就要启航

● 主编 邓先明 胡海 ● 张静 霍丙森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 目 录

一、在困境中起步	
——国有(营)企业建立和初步发展	( 1 )
新中国诞生在“一穷二白”之中	( 1 )
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初步建立	( 7 )
“大跃进”，一跃而下；八字方针，走向探索	( 13 )
二、曲折前进	
——国有(营)企业改革和发展	( 21 )
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斗争	( 22 )
恢复	( 25 )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30 )
三、前方的路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分析	( 43 )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涵义	( 43 )
关于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	( 46 )
企业“抓大放小”问题的研究	( 49 )
破产——亏损严重的企业的一条可行之路	( 55 )

<b>四、未雨绸缪</b>	
——国企改革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59)
目前企业集团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59)
股份制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几种偏差	(69)
生存还是死亡——国企“卖牌合资”现象透视	(74)
<b>五、他山之石</b>	
——国有企业成功案例分析	(79)
邯钢经验告诉我们什么？	(79)
振兴国企的“武汉之路”	(82)
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班子”	(85)
从“四鹤”齐飞说强强联合	(90)
巧施资本运营，搞活国有经济	(92)
实施大集团发展战略——海尔扩张之路研究	(94)
改造内部机制——北京东安集团改革纪实	(102)

# 一、在困境中起步

## ——国有（营）企业建立

### 和初步发展

#### 新中国诞生在 “一穷二白”之中

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华民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终于告别了近百年的屈辱史，走上民族复兴之路。

然而，新中国诞生初期，面临着战争和黑暗统治给我们留下的烂摊子：全国年产钢量仅有 15.8 万吨，人均占有量不到 1 公斤，连铁钉都需要进口；全国年发电量 13 亿度，年人均仅 8.6 度；年产煤 320 万吨；年产原油仅 13 万吨……

还有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贼心不死，仇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妄图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襁褓之中。

1950 年 12 月 14 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中国实行大禁运，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公报：“美国政府今天已采取措施，

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之一切财产置于管制之下，并颁布章程禁止在美国登记的船只在另有通知之前驶往中国港口。”1951年5月18日，美国通过其操纵的五届联大通过《实行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英法等国投票赞成，并公布对华禁运货单。

新中国内外交困，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反革命破坏，国外反华势力虎视眈眈，伺机反扑。

一位西方名士断定：中国共产党无法治理这个国家经济上的创伤。

中国共产党却自信地宣告：我们有能力打破一个旧世界，同样我们也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一穷二白”作了新的阐释：“‘一穷二白’不一定是坏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正好可以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伟人的话如一盏指路的明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照亮了前方的路。

### 畸形的中国近代工业结构

中国近代工业就像一个既聋又哑还跛的残疾人，在风雨中艰难地挪动他那单薄的身躯。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各部门发展极不协调。如在重工业内部，采矿和冶炼比重失调，采矿比重过大，冶炼比重过小。抗战之前，中国铁矿石产量是铁产量的近10倍，超过钢产量近100倍，生铁产量大大超过了钢产量。

此外，近代工业水平低下，我国的机械工业不能制造汽车、拖拉机，甚至可以说中国近代根本没有机械工业。想要为其他生产部门制造设备只能是说说而已。

再以工业布局来看，近代中国工业分布极不合理，主要

集中在东北和东南。广大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面积占全国45%的西北和内蒙广大地区，其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全国90%以上的发电站集中在东北和东南沿海几个大城市，全国70%左右的棉纺锭和布机，集中在上海、青岛和天津三大城市。

解放初期我国工业水平同外国相比，差别更是显著。1949年，美国卷烟是中国的13.68倍，生铁为199.28倍，水泥是54.45倍，原油产量是中国的2047.33倍。如果再考虑人口因素，中国的落后更令人触目惊心：人均钢产量，当时的苏联、美国、英国分别是中国的196、418、218倍；人均发电量，三国分别是中国的27、141、63倍。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近代工业其他工业品量（值）比方面也是普遍现象。

新中国的国有工业就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

### 国民经济恢复

新中国的领导人，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放下步枪，脱下军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建设中去。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做了报告，对解放之初中国的经济政策作了详细说明：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制度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也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举措。

没收官僚资本，转变为国营企业。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 20 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 100 万万至 200 万万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所占有的官僚资本的性质和数量。的确，到 1949 年全国解放前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 2/3，全国工业、交通运输的 80%，它垄断着全国钢铁产量的 90%，煤产量的 33%，发电量的 67%，石油和有色金属的 100%，水泥产量的 90%。四大家族的搜刮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毛泽东在 1947 年 10 月指出：“在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

1949 年 4 月 25 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明确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方法：“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如秋风扫落叶般的胜利前进，通过压榨与剥削堆积起来的官僚资本又回到了人民手中。仅仅几个月，人民政府没收的官僚资本工厂企业 2858 家，其中发电

厂 138 个，采煤、采油企业 120 个，炼钢厂 19 个，金属加工  
厂 525 个，化学加工厂 107 个，造纸厂 48 个，纺织厂 241 个，  
食品企业 844 个。

1951 年 1 月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  
僚资本家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对战犯、汉奸、官  
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也进行了没收。同时又对一些  
不法分子隐藏在私营企业中的股份，进行了广泛的清理。

至此，没收官僚资本工作已全部完成，被没收的官僚资  
本、企业和财产，就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要来源。

列宁曾说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  
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空前壮大，社会主义  
国有（营）企业也在旧中国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吐  
出了新绿。

新中国成立了，百废待兴。

新生的人民政权，首先进行了三年的恢复。

通过取缔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  
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使  
之逐渐恢复元气并逐渐壮大。

面对有限的财力、物力，中央决定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  
刃上，走计划经济道路。

1951 年 2 月 19 日，朱德在全国工业会议上着重指出：中  
国工业要走上计划经济。中央已决定自 1953 年起实行 5 年计  
划。不但必须研究工农业的配合，还要与苏联、东欧等国配  
合，使我们的订货纳入他们的计划。

1952 年 2 月 9 日，中财委向中共中央报告聘请苏联专家



帮助改建和新建工厂的情况。报告指出，两年来，我国工业的恢复，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利用工厂原有装备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来，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 42 个，其中东北 30 个，关内 6 个，新疆 5 个，内蒙 1 个。我们称苏联为“老大哥”，苏联“老大哥”的帮助给当时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工业生产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的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

工业总产值迅速增长。1952 年比 1949 年工业产值增长近 1.5 倍，1950~1952 年间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为 34.8%。主要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大大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1952 年与 1949 年相比，钢增长 7.5 倍强，生铁 6.6 倍强，化肥 7.6 倍多。另外，工业品种也大大增加，以钢为例：解放前，所能生产的品种不到 100 种，1952 年则能生产 400 多种。

除了调整和恢复原有的工业，还设计和建立了一些新的厂矿企业，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推广新的生产经验，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国营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仍以钢铁工业为例，解放前，我国钢铁工业十分落后。到 1952 年，我国已能生产钢材、钢板和无缝钢，并且能为机械工业中高速切削法、多刀多刃切削法所用的高标准刀具提供优质钢材。能够制造矽钢片，为电机工业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提供了可能。能够制造薄板钢，为汽车工业发展提供了可能。并且我们已能独立轧制钢轨，当时建成的成渝铁路全长 305 公里，就全部用自制的钢轨铺成。

经历了五千年文明熏陶，近百年屈辱，近百年抗争的中

华民族的脊梁，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又一次挺直了，并且再也不会弯下去了。

## 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初步建立

### 总路线的提出与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后，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十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后，刘少奇、周恩来都详细地论述过“从现在过渡到社会主义上去”的大致设想和指导方针。1953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做了完整的表述。

同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在审定时写了如下一段话：“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2月，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总路线。从此，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在总路线的指导下蓬勃发展。

1953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国开始执行国家

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布：“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动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建设计划而奋斗，是贯穿全年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54年，周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经济建设工作在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从此，中国人民以百倍的信心和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 优先发展重工业

列宁说过：“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没有国有（营）大工业，就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就不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

全国解放之后，经过1949~1952年三年的改造恢复，国有经济发展很快，国有企业的数量都已超过以前的历史水平。但就整体水平而言，依然非常落后于其他大国如美、英、苏等。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工业化程度低，国有工业企业力量薄弱。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放在首要地位，必须重点发展国有工业企业，重中之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也就是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等等，才能制造现代化的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和轻

工业得到技术改造；才能供给农业以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充足的肥料，农业生产水平才能大幅度提高；才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并且不断地改造它们，使运输业得到技术改造，迅速发展；才能制造现代化武器，巩固国防……

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人国家的富强。”

在重工业中，最重要、最急需的是发展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建设国有（营）钢铁企业。

1952年5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财委的《关于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地区分布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的骨干，没有钢铁工业，就谈不上机械制造业，也谈不上国家的工业化，钢铁工业的方针和地区分布问题解决了，才能对其他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做合理的配置。

报告进一步确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必须把鞍钢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全国的力量，如期完成，以奠定全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计中鞍钢的生产规模为：年产生铁250万吨，钢材250万吨，职工总数为50536人，设备总动力51.5万千瓦，全部工程确定自1952年至1958年七年内完成。

报告还决定建设新中国的第二个大钢铁企业，地点选在大冶。因为要改变我国钢铁企业的落后状态，必须紧赶一步，于八年内达到500万至600万吨的产量，才有可能在十二、三年内达到年产1200万吨。只抓鞍山一点，将限制钢铁产业进一步发展，但如果多点建设，必将分散力量、顾此失彼，反而延误钢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确定了两点建厂的方针，

另一点就选在大冶。大冶地处我国中心，又有长江水运之便，产品可就近供应。另外从经济和国防上考虑，大冶也是比较理想的选地。报告决定：首先进行鞍钢的恢复与改建工程，争取迅速完工。同时，抽调力量进行大冶矿山地质、工程地质的勘测、钻探、研究和厂址选择工作。

从此，中国的钢铁工业开始了飞速的发展。直到全民动员，大炼钢铁时，“欲速则不达”的格言使我们的钢铁工业发展拐了一个弯。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反思之后，中国的钢铁工业才真正构造起中国的钢铁支柱。

### 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初步建立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57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比重增大，新中国的工业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44.8%，上升到1956年的71.6%，社会主义工业产值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工业基本建设规模扩大，在“一五”期间，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50亿元，折合黄金57000万两以上，在实际完成的工业投资中，工业部门投资占42.5%，达250.26亿元，几乎占全国总投资的一半。五年中，由于进行基本建设而新增的固定资产达200.64亿元，重工业是工业建设的中心，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中，重工业投资占87%，轻工业占13%，农、轻、重比例为7.1:6.4:36.1。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得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支持和帮助。到1957年底，苏联帮助建设的156个重大的建设项目，

有 135 个已经施工建设，有 68 个全部建成和部分投入生产。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帮助我国建设的 68 个项目，到 1957 年底，有 64 个已施工建设，有 27 个已投入了生产。

五年之中，在施工的一万多个工矿建设单位里，限额以上的有 921 个。这 900 多个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是我国现代化大工业的骨干，它们的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基础。这些，即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根。

**大批新建与扩建企业投入生产，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的落后面貌，我国的工业实力大大提高**

“一五”期间，大批新建的企业投入生产，迅速改变了旧中国落后的工业面貌。

——在旧中国连想都不能想的一些技术要求特别复杂的新工业部门，像飞机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部门相继出现了。

——生产力飞速的提高。旧中国经历了 60 年才建起的不到 200 万吨的炼铁能力，不到 100 万吨的炼钢能力；经历了将近 70 年，才建设起不足 190 万千瓦的发电能力。新中国五年中新增加的炼铁和炼钢能力，等于旧中国 60 年的 1.5 倍和 3 倍，新增发电能力也大大地超过了旧中国 70 年的总和。就轻工业而言，拿旧中国发展较快的纺织行业来说，从 1890 年到 1949 年 60 年间，只建起 500 万只纱锭，而新中国从 1949 年到 1955 年 6 年，新增纱锭 152 万多只，为旧中国 60 年的 30%。

——工业设备和工人技术装备水平大大提高，到 1956

年，我国已拥有了一些新型的、现代化的设备。1955年建成一座高温、高压的热电站。到1956年6月，单机容量在2500千瓦以上的发电机占全国发电设备容量的22%，单机容量1200千瓦以上的则占46%。煤炭工业已建成年产能力达300万吨的海州露天煤矿，能力达90万吨的辽源中央竖井、鹤岗东山竖井。到1956年，钢铁工业已建成自动化高炉5座。

“一五”时期，我国已能设计一些较大的技术复杂的工程项目，如年产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240万吨的煤矿，年产7.5万吨的合成氨化肥厂，装机总容量199万千瓦的水电站、65万千瓦的火电站。

——工业布局日趋合理。解放前，工业分布多偏重于沿海，内地工业很少，造成内地徒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却捧着金饭碗受穷挨饿。为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国家对工业投资地区分配做了调整。

沿海地区新建企业适当减少，内地新建企业适当增多，在“一五”的头3年，全国半数以上的投资用于内地各项事业建设，并且尽量和原材料、燃料产地相适应。新中国对黑色金属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因为这里的煤、铁资源十分丰富。再如棉纺业分布由上海、北京、天津向内地的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产棉区扩散。

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也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主要集中于内蒙、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其中多用于交通运输和工业建设。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证明：没有任何困难会吓倒中国人。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民族。

沉睡的巨龙缓缓睁开了它的眼睛，注视着风雨欲来的天空，只是轻松地摆动了一下身躯，20年已经过去了。

## “大跃进”，一跃而下； 八字方针，走向探索

###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塞翁失马，柳暗花明，乐极生悲。古老的中国文化，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一个永恒不变的道理——福祸相依，物极必反。人、事乃至一个国家，都逃不过这只冥冥中的手。

1957年，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少见的好年头。

胜利激励着每个劳动者，继续大干的念头冲击着每个建设者的头脑。人们的脑袋变成熟了，迸发出冲天的豪气。共和国的掌舵者也在这一大环境中激动起来了。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拟定了《工作方法十六条》，对1956年以来的反冒进，进行了集中的严厉批评。并提出，以后不许再提反冒进口号。

毛泽东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士气，可鼓不可泄。

1958年3月9日，成都会议，毛泽东主持继续批评1956年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总路线，并提出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里，在主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性精神。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中，毛泽东这样解释多、快、好、省，他说：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高，又要少用钱，那么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争取尽可能的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的“多”、“快”。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不是伟人所能安排的。

“左”的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 “大跃进”，敢叫日月换新颜

“大跃进”的提出和实施是从“反冒进”开始的，从1956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到1957年9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终于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的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国家报刊上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全国人民摩拳擦掌，士气高昂。